

目 录

一九三八年文水牺盟分会的组织和活动·····	李 新 (1)
李新同志的一封信·····	(1)
一次别开生面激动人心的动员大会·····	赵光明 (4)
文水人民申请停止借征钱粮 (田赋) ·····	王钟彦 (5)
在敌人心脏里战斗·····	孟春华 (6)
杀死坏蛋刘子仁,放了便衣王彦龙·····	陈德照 (28)
夜袭王家庄·····	周占科 (8)
忆坡头阻击战·····	周占科 (10)
西庄镇战斗概况·····	张贵仁 (11)
八月十五杀鬼子·····	田肇利 (13)
穆生金烈士简传·····	县政协文史编委会 (12)
忆郝耀同志·····	张松涛 (14)
回忆李光展同志·····	张松涛 (15)
我的启蒙老师孔玉兰·····	吕云仙 (15)
常马英烈士传略·····	县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 (16)
民兵巧摆地雷阵·····	赵克俊 (17)
回顾文水民兵连参加晋中、太原战役概况·····	穆照谦 (19)
文水县抗日政府的铜印·····	文堂、照谦 (9)
鸦雀争夺凤凰城·····	文堂、照谦 (24)

姜文佐因何自杀	赵玉卿 (26)
日伪间的一幕闹剧	赵玉卿 (27)
一个“变色龙”	穆照谦 (40)
文水商人独揽北京城干鲜果行的概况	岳寿椿 (29)
文水县解放前商业概况	武静山 (32)
从前文水城内的钱行多	穆照谦 (34)
武福贵发家简史	武静山 (35)
赌博庙会 (小资料)	赵光明 (3)
孝子渠拳师“左二把”的传说	武静山 (36)
长拳名师李毓秀	王通高、穆照谦、张振文 (37)
老十三红张景云	文堂、逸民 (41)
赵廷杰传略	郭建民 (42)
翟全晋简传	岳寿椿 (44)
小南安村天主教史	小南全村 (46)
私塾先生郭家玉	逸民 (48)
我县政协委员武静山编出《中草药炮制法》	
.....	文堂、建国、效中 (47)
《文水县政协志篇目》初稿	(封二)
抗日“断桥”(晋剧)	田肇根 (封三)

文史资料员李新同志给编委会的

一封来信

文水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同志：

两次寄来的材料都收到了。你们出的文史资料刊出了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九年文水牺盟会的情况，而空下一九三八年的情况。为此，我写了一九三八年文水牺盟会的情况寄上。我认为这是近半个世纪前的旧事，现在要把它具体地详尽地写出来

是很困难的，而且当时情况就是那样，要把它写得很像回事，就不合当时的实际了。因为年代太长，有些具体情况，包括连一些人的姓名都忘光了，只能简述而已。

李 新

九月十三日

一九三八年文水牺盟分会的 组织和活动

李 新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太原后，一路沿同蒲铁路南进，占领了太谷、祁县县城；另一路沿太汾公路进军，占领了清源、交城县城。当时文水县城由阎军七十一师据守着，可是阎锡山原来委任的县、区长等政府工作人员，早已不见人影了。牺盟会特派员许铁民，带领一部分人组成了游击队，上山打游击。当时，阎锡山曾委任文水绅士杜凝瑞为文水县长，实际也没起多少作用。文水平川广大农村处于无政府状态，人们既怕散兵游勇，土匪盗贼劫掠，更怕日军杀人放火，

人心惶惶不安。

一九三八年农历元宵节前后，日军继续沿同蒲路、太汾公路南下，平遥、介休、文水、汾阳等县城相继陷落。县城里的豪绅巨商，出而组成“维持会”为敌效忠。文水县城以米育英为会长也组成了“维持会”，效忠日军。当时日伪的统治，还未能推行到广大农村。

文水县城失陷后不久，八路军一二〇师的工作人员，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游击三支队等武装部队，从山上来到平川，开展游击战争。牺盟会、工卫队委任顾永

田为文水县长,抗日民主县政府宣告成立,同时派白生华为文水县牺盟分会特派员,恢复牺盟会的组织和活动。

随着游击战争的开展,抗日政府的建立,日军龟缩在县城内,很少出来活动。广大农村掀起抗日的高潮,到处响起抗日救亡歌声,不愿做亡国奴的人,特别是青年纷纷参加抗日军队、抗日团体和抗日政府工作。文水县牺盟分会到五、六月间,已发展到一百二、三十人,建立了县、区牺盟会分会,各村普遍建立了牺盟会村支部。

县分会特派员白生华,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平遥仁庄村人,七、七事变前当小学教员,一九三七年冬季参加工卫队。仁庄紧靠文水,白生华在下曲上过高校,在徐家镇当过教员,在二区一带最熟悉。他下山后就在二区活动,当时下曲、徐家镇、南北齐等村,参加牺盟会工作的人最多。

当时参加牺盟会的人,大部分是二十岁左右的知识青年,也有些年龄较大的成年人,有的是村长,有的是小学教员,参加武装工作队的大多是青年农民。

北齐村长任子英是最早参加牺盟会的人,帮助白生华开展工作,起过好的作用。六、七月间县分会在梁家堡村公所院内住,一天晚上被平遥来的日军包围,突围时任子英牺牲了。此后南齐村村长潘荣光也参加了县分会工作,成为白生华的助手高参。在县分会的主要人还有南齐的段子庆、潘晋儒、下曲的宁广钧、门世的李子珍,分别负责组织、宣传、秘书等工作。

一区分会秘书是张英,平遥人,一九四〇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边山区(可能是七区)区委书记,同年冬季反扫荡时病故。

二区分会秘书魏景谦,大象镇人,工作人员最多时有十几个人,现在能记起来的有史久承,其余都记不清了,我当时就在这个区工作。

三区、四区分会秘书都失记了。记得在三区工作的有史荣轩(下曲人),现在辽宁已离休,还有陈子清(即王彪)、石得义等。

牺盟会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发展牺盟会员,组织牺盟会村支部,协助村政权工作,推动农青妇各会工作。

武装工作队当时有四十余人,有十几条步枪,还有手掷弹、大刀等武器。队长是在旧军队当过兵的人,名字失记了。主要任务是随县分会活动,担任警戒除奸工作。

到七、八月,敌人在开棚、东庄,以及文汾边界仁岩村增设了据点,出来活动也较多了,环境有所恶转。武工队将枪弹交杜村村公所保存起来,让队员各自回家。后来被国民党军一六九师(住在南齐村的一部份人)得知,遂将枪弹抢走,后经过交涉仍要不回来,白生华和县政府秘书彭敏联系后,彭敏带游击队,以武力解决了一六九师那部份人,才将武器要回。

临汾失陷后,牺盟总会随二战区长官部到吉县。为了加强各县牺盟会工作,当时专区派出了牺盟中心区委员会,文水受太原中心区领导。这个中心区住在交城山会立村,负责人(秘书)是金少英。

当时文水牺盟分会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报酬,住到哪里吃到哪里,办公经费也是向各村征集。秋天,太原牺盟中心区召开了各县特派员会议。中秋节前后,在东堡村县分会驻地,召开了全县牺盟会干部会议。会上白生华传达了中心区会议精

神，其中一条是：县、区分会要定员定职，工作人员职务是特派员、协助员。特派员每月薪金二十元，协助员十五元（山西省银行钞票），办公经费也有规定。各县定员定职报中心区领取，不得再到村里白吃，也不得向村里征集粮款。会上宣布了县区分会留下的人员名单，其余的愿学习者，可到中心区训练班学习，不愿去学的人可以自便。这次会议后，不少人离开了牺盟会，有的参加了八路军一二〇师，如从平遥城出来的刘×、王××；有的参加了一一五师，如杜家庄的陈××；有的参加了区公所工作，如石得义；有的被民族革命大学六分校招收，如石久承等。

东堡会议后，敌人活动多起来，环境较前半年更恶化。县、区牺盟会的工作人员日渐减少，到一九三八年底，一九三九年初，还在坚持工作的只留下白生华和一区的张英了。

史荣轩、梁团生和我是在十月间上山，到太原中心区训练班学习。以后陆续又有十几个人，也上山参加学习，记得有陈子清、温颐年等人。这个训练班由李柏林同志主持，他的公开身份是中心区组织

部干事，实际上是中共交城中心县委民运部长（这是后来知道的）。当时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持久战、游击战争问题等。参加学习的分四个班，共四十多人，是从交城、阳曲、清徐、太原、徐沟各县来的。记得交城来的华国锋、李广谦、阳曲来的有苏建益、清太徐来的有李又生和几个女同志。学习从十月开始到十二月底结束，史荣轩、梁团生回到文水县分会工作。我是一九三九年春节后回到文水，当时白生华上山到了中心区，县分会由史荣轩临时负责，还有梁团生，其他人都不在，后来温颐年、陈子清也回来了。

一九三九年初，为了防止阎锡山派公道团的人来各县活动，太原中心区，各县、区分会对外都改为牺公会，并派任悟僧担任文水牺盟分会特派员，白生华为文水县主张公道团团长，陈华为副团长（任、陈都是共产党员），这就加强了领导。他们来后，文水的工作又逐步发展起来，张英仍坚持在一区活动，其他同志都集中二区工作，七、八月之后，二、四区也有了区分会，开始开展工作。

赌 博 庙 会（小资料）

“七·七”事变之前，我县北徐村的柏岭坡和县城以西五里地的龙王头，每年二月初二和四月廿八赶赌博庙会。会上没有什么生产、生活资料的买卖交易，而是有一、二百名本县和外县的赌棍，聚会在一起，自由自在地赌博一天，官府也不加干涉。赌博项目有：押宝、掷骰、推牌九、跌钱儿等。赌注少至一、二元，多至一、二百元。在这种会上也有少数卖熟食的，专供这些特殊赶会者食用。

（赵光明）

一次别开生面激动人心的 动 员 大 会

离休干部 赵光明

一九三七年八月，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为了发动群众团结抗日，文水县各界群众开了一个大会。由于这次大会开的既严肃紧张，又生动活泼，使我永远不能忘记。

那天，文水城内四道街响起了锣声，鸣锣的人边走边喊：大家听的！今天晚上“牺盟会”在文庙（即孔庙，现在的县委驻地）开大会，不论男女老少都去文庙参加开会。

大约晚八时左右，人们川流不息，进入会场，大家心里揣摸着到底开什么会呀。过了一会，牺盟会的人宣布开会，出乎人们予料的宣布说：我们抓到了一个日本特务，今天当众审讯，希望大家提出处理意见。接着由两个人押着一个身穿便衣，被五花大绑的人走上台。审讯人说：今天抓到你的时候，我们向你交待了政策，承认了你是受日本人的指示，来文水做探子，你现在当着大家的面好好交待清楚，我们一定能从轻处理。探子战战兢兢表示诚意说：我一定如实说。会场静悄悄的。探子想了一下说：唉，我实在不对。我是忻州人，去大同走亲戚，被日本人抓住，说我是中国兵，后经我亲戚用了好多办法保证我不是当兵的，可是日本人坚持不放我，非要我到太原以南打探情况。这时“牺盟会”的人插问：打探什么情况？探子说：看看有多少军队，武器怎么样，

老百姓想些什么事。这时，会场上群众窃窃私语，有的说：怎么还要知道咱们老百姓想什么呢！有的说：那当然要知道你恨不恨日本鬼子，如果老百姓不恨，他就高兴了。有的说：日本鬼子尽想好事，我们是中国人，还能不恨他吗！这时台上“牺盟会”的人又问：除了要你打探消息，还让你干什么？探子胆怯地说：他们还给了我一些药，叫我在中国兵多的地方的水井里投放，要毒死中国兵。审问者问：那你在什么地方投放了？探子说：在太原以南的沿路，我投放了几口井。顿时会场激愤起来，这个说：日本人太可恶。那个说：汉奸更可恨，这可了不得，大家必须注意逮坏人。台上“牺盟会”的人要求会场安静下来，继续问探子：你看到日本人如何对待中国人？探子说：日本人根本看不起中国人，见到中国人想打就打，想杀就杀，见到妇女就强奸，用刺刀穿上小孩举起来看热闹，见到老汉抓胡子，见到老太太拽一只小脚跑。这时会场上象炸了锅似的乱说：不行，得狠狠打狗日的。台上突然喊起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整个会场顿时喊起了口号，群情激愤。安静下来后，“牺盟会”的人给大家讲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大家起来抗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会议最后，“牺盟会”的人才对大家说：刚才我们是给大家演的一幕活报剧，

虽然是一幕剧，但探子口里所说的完全是事实，日本人就是那样残忍，就是要亡我们的国家，我们决不当亡国奴。口号又喊起来：誓死不当亡国奴！

这一次大会，在当时唤起民众，动员组织文水人民参加抗日，组织游击三支队起到很大作用。

文水人民申请停止借征钱粮(田赋)

王 钟 彦

阎锡山自一九二四年开始，连年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战祸不断蔓延。尤其是从一九三〇年四月发动倒蒋大战失败后，将同他联合作战的冯玉祥所部，以及各杂牌军队，引入山西境内。高桂滋部驻平定，孙殿英部驻晋城，宋哲元部驻运城，刘汝明部驻解县，鲍刚部驻介休，他们给山西人民带来的损失和灾难，是无法估计的。

当时每月军饷的开支就需五百万元。阎锡山只好加紧对山西人民剥削勒索，置人民于死亡线上。一九三〇年夏季，财政厅通令各县将该年下忙应征的钱粮和上忙一次并收（钱粮向来分前后两季完纳，名为上下忙），并限六月底清解，每亩约需银元三元。又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发出虞电，声明从七日以后，人民须用晋钞完纳钱粮，两元折合一元银元。到一九三二年即改为二十元兑换银元一元，而交纳钱粮得用银元。这样从一九三〇年底即发出予借一九三一年的钱粮，直到一九三三年秋，即要把一九三六年的予借征收了，从此逼得人民无法生活。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文水全县七十二坊都的户头、里地集中在南贤八角寺开会，讨论请求停止预征钱粮。当时文水四个区，每区推选四个代表

参加这次会议。一区的代表是成信（笃斋）、刘玉辉、胡静康和我，二区是范天章、李晋华等，三、四区的代表已失记。开会后四、五日内即遇安汾水利局局长换届选举之时，当时文水的县长是郭同仁，他给这些会议发起人扣上“和陕北刘志丹同志有联系”，是闹抗粮运动的罪名（当时为“戴红帽”子），遂即把二区代表范天章和李晋华扣押起来。

我们向县长把开会情况详细叙述了，说一年要征几年的钱粮、晋钞价值暴跌、物价一日数涨，人民生活限于绝境，他们终年劳动所得之晋钞成为废纸，请俯察下情，体恤人民疾苦，救民于倒悬之中，焉能用“戴红帽”之罪名扣押代表们呢？务希早日释放等等。

从这以后，对各区代表再未追咎，所扣之范、李二人，几个月后也行释放。

〔注〕

当时全县七十二坊都，都名多、坊名少，都下属是甲。如孝义镇为孝义都，西城镇为西城都。南张村、北张村为南仁都，武村即属南仁、安青、明阳三个都，明阳村为明阳都。文水城关为安乐坊，还有名为治善坊的。都里有户头、里地之称。里地是承揽收征钱粮的人。

在敌人心脏里战斗

离休干部 孟春华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屈指一算，抗日战争胜利已经四十个年头了。县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约我写个回忆“抗战”的文章。虽然个人文化水平有限，但为了纪念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不能推辞，欣然提起拙笔，将我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底这段时间内，党组织决定，打入日伪信贤据点，以灰色面貌出现，进行革命斗争的经历撰写成文，也许能够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时隔四十多年，有些事实情节很可能有所遗漏，尚望得到老同志老战友们的补正。

我在幼年时家境贫寒，只上了三年小学，于一九三九年春，经人介绍到了祁县谦和成杂货店当了店员。因祁县离我家很近，有时候我回家住，经常和住在我家的抗日干部刘芳（现名李静波）、秦汉三同志接触，他们对我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使我对革命有了认识，于一九四一年十月由陈德照、韩汝范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一九四二年春，掌柜的申贺源要我去曲沃烟店当管账先生去，当时我想，咱年轻的，应该参加到抗日队伍的行列，于是我辞掉祁县的买卖回到家来。当时常住我村的隐蔽县委委员魏范初、敌工站刘芳同志和我谈话，要我以经商的面貌，到日伪信贤据点搞地下工作。于是由我姐夫蔚秀华介绍去到信贤村久运货庄当了店员。在这段时间内，做了一些一般性的情报工作。

日伪信贤据点里有个警备队长杜子兴（太谷人），他常到久运货庄打牌，我认识了他。当时杜子兴收家礼徒弟。党组织决定，让我通过杜的关系，打入敌人内部，以灰色面貌出现，搞地下工作。于是我参加了杜子兴的家礼，我和杜便成了“师徒”关系。后来我就和杜说：“我在这儿伺候人养不了家，你能不能给我找个事干？”他说：“文水宪兵队要在信贤成立情报组，需要两个人，等我和岳德胜说一下，你可去情报组。”听他说需要两个人，我就想到我村党员石居高来，便和杜说：“我有个同学石居高，他也想找个事，是不是也给说一下？”杜说可以。不几天后，我和石居高便进了敌情报组，当上了武装“便衣”。

到了敌情报组后，目的是搞地下工作，但为了伪装的像，也得逢场作戏，到了村里也得胡咋唬，村里给一些小钱还得收，有时村里给纸烟，也得吸，总得装的像个“汉奸”，这样不至于暴露自己真面目。

情报组组长岳德胜，和我相处中他常这样说：“咱们中国人伺候日本人，有什么出路？”并问我：“你们村有没有八路的人？你能不能给我引见引见？”我回村后将岳的话告诉了刘芳同志，刘表示同意。所以，有一天我引上岳德胜回到云周西，在石国英同志家刘岳见了面。后来我才知道，我去情报组前，岳德胜已经和我六支

队、敌工科建立了关系。那时我和居高常跟上岳出发，每七天与我方人员联系一次，或往外送一次情报。我们和咱们部队联络的信号是鸣枪，每到一村我们先打一枪，咱们的部队就知道是我们来了。有一次我们三人去了北辛店，该村村长贺希先是个两面派，他既想讨好日伪，又怕得罪八路，他见到我们三人，就报告了我六支队王、张二位队长，说他家中来了三个便衣。王、张知道是我们，说：“我们研究一下……”就没有理睬我们。

南贤村有个在下曲据点当便衣的家伙（名字忘了）很坏，组织上决定处决他。魏范初同志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和岳德胜去完成。约在一九四三年春的一天晚上，我和岳去到南贤村和该村的一位地下党员（名字忘了，一九四九年南下）配合，把这个汉奸抓出来活埋在村外。

信贤村有个日伪合作社。一九四二年秋我方决定进据点内抢夺合作社的物资。当时信贤村有个焦大林，这个人原来是个穷小子，以屠宰为生。自住下日军后，他贩卖料面（毒品），又爱赌钱，发了财，买下地六十多亩。他常到云周西赌博。这个人既和我方人员有联系，又和日伪有勾结，是个两面讨好的人。刘芳同志决定利用焦大林，便告常和焦一起赌博的刘树旺先和焦大林说通，刘芳要亲自到据点内和焦见面。几天之后，刘芳头戴礼帽，身穿大褂，手带金戒指，打扮成大商人模样，由刘树旺和我相随去到焦家。焦的家在信贤围墙东北角处。刘和焦谈妥，这次行动由焦作响导，接应我方部队进去。几天之后（日期记不清了）的一个晚上，由焦大林引路，我六支队百十多人进了据点，从日伪合作社抢出火柴二十多箱、布二十多匹、煤油十余桶。日军因为此事，后来将

合作社主任赵芳和文水城内一个字号的管账先生杀死在信贤村外，并将赵芳的头在信贤门上号令了三天，其罪名是他们“通匪”。

一九四三年秋季，我方六支队决定解决西社据点的伪军。当时西社村北边伪军据点有两个碉堡。西碉堡驻一个伪军中队，队长岳维琪（文水岳村人，一九四五年解放文水县城时被我军击毙）。东碉堡驻一个伪军中队，队长吕子卿，此人与我方早有联系，吕到西社驻防前，刘芳同志曾叫我往城内给吕送过一次信。

有一天刘芳、魏范初交给我一个任务，说吕子卿要反正，他给我方绘了个图，图上标明据点内兵力分布情况，枪支弹药和电台放在什么地方，要我去西社找吕子卿取这张图。

我接受了这一任务后，骑着车子去到碉堡前，问放哨的伪军，“你们吕队长在不在西社？”哨兵问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他的朋友，有事找他。”就在这时吕子卿走出据点门，他见是我，就向我招手叫我进去。我进了据点院内，吕把我让进他住的西房内。吕子卿女人问我的是哪儿的，吕说是他的朋友。吕揭开他的皮箱，拿了个东西装进衣袋里，对我说：“咱们到饭铺内吃顿饭。”我们相跟上去，进了饭铺，进了里间，要了一壶茶我们喝着，吕问我：“你是拿图纸来了吧？”我说：“是”。吕从衣袋里拿出图交给我，我挽起裤腿把图装进长筒袜子里。吕告诉我：回去告诉咱们部队领导，于某日晚间十二点钟（日期记不清了）准时进来，我把据点门栓放开，他们一推门可以进来。我带上地图回到云周西，把地图交给刘芳和六支队的王、张二位队长，并把吕的话告了他们。当天晚上他们研究了作战计划。

第三天就把部队从杜村一带调往麻家堡，下午刘芳叫我和石居高去给队伍带路，我俩去了麻家堡找到六支队的姚政委，说明来意，他很高兴。大约当晚十时左右，姚政委集合起队伍，作了战前动员。他说：“今天晚上有特殊任务，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动员之后，我和居高领路，部队向西社出发了。到了西社渡口，把渡口上的两个人捆了起来，栓在门环上。部队从西社东北角的豁口进去，把鞋脱掉，走到一片枣树的地方，王振邦队长带一中队打西碉堡，张德成队长带二中队进东碉堡。我给二中队带路。走至东碉堡前，战士们把云梯放在铁丝网上，一个挨一个地到了敌据点门前。有个新战士刘谋儿，北齐人，个子小，衣服大，他第四个过铁丝网时，把裤子挂在铁丝上响了一声。炮台上的伪军听见响声，像是一个班长告诉伪军说：“外边有动静，你出去看看！”张队长和战士们紧贴墙不动，赶得那天晚上是阴天，伪军出来没看清就返回去，说外面没事。略停了一会儿，张队长上前推开据点门，带战士们冲了进去，敌人听见门响，就从炮楼上扔

到院里两个手榴弹，当场把刘谋儿腹部炸伤，抬到枣树地里，经急救无效牺牲。张队长带领战士们二次冲了进去，往炮楼上扔手榴弹。这时吕子卿在他住的家向伪军喊话：“不要打！是自己人！”就这样东碉堡伪军三十多名全部交械投降，有的还在睡梦中就当俘虏。姚政委进据点里把吕子卿及其老婆和一个孩子接了出来，战士们把枪支弹药等取出。东碉堡就这样结束了战斗。

这个时候一中队攻打西碉堡很激烈，双方的机枪嘟嘟嘟地叫着，“伪军弟兄们缴枪吧！”“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在喊着。但是岳维琪这个死心塌地的汉奸，死硬顽抗，直到天快亮时也没拿下西碉堡。一中队的一名机枪班长牺牲。部队领导考虑到天明后敌人会来增援，只好撤出战斗，把队伍撤到王家堡。

这次战斗，俘敌军三十多人，缴获步枪三十多支，手枪两支，机枪一挺，子弹七八箱，电台一部。

自西社战斗以后，我们已被暴露，所以我和石居高正式离开信贤据点，参加了我方游击队。

夜袭王家庄

周占科

我是一九四三年春天参加我晋绥八分区六支队的。在十二连呆了一段时间后，于当年冬天新兵连解散，新兵被分别补充到三个老连队，我被拨到九连当战士。这一年，抗日战争虽已由防御转向相持阶段，但从我区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来看，敌

强我弱的状况仍未彻底改变。在冬季“大扫荡”中，日军的铁蹄所至，无不烧杀抢掠，惨景目不忍睹，什么“九路围攻”呀，什么“铁壁合围”呀，给根据地军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确实，当时根据地的环境还是很恶劣的，人民群众的日子还是

很难熬的。

在反扫荡告一段落，将迎来新的一年——一九四四年新年前夕，三、六连均先后打了胜仗，为新年献了礼，这时九连也必须打一个胜仗。记得距新年只有两、三天的时间了。一天，部队开到二道川的一个山庄上。午饭后，全连集合，指导员作了动员。夜幕降临后，部队开始出发，经过几个小时夜行军，大约午夜时，到达了文水边山的王家庄村，各班分别在老乡家休息喝了些开水，做好了战前的准备。当部队下到沟底时，又就地休息了一个小时左右。这时，有些战士憋不住了，不时发出咳嗽声。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预先准备好的烟土（有绿豆颗粒大）噙到口内，有的扒在地下、嘴唇对着地皮轻轻地咳几声。万籁俱寂，夜色朦胧，我们开始向敌人驻扎的山上运动了。在弯弯曲曲的崎岖小路上，一层层梯田盘旋而上，塄塄凹凹显得耀眼，口令不时地从前面传向后面，战士们分两路从南北两面往上摸，轮番匍匐前进。山头上没有铁丝网，一个敌哨兵端着枪，后面跟着一只军犬，来回走动。当哨兵转向南面时，北面的战士们便向上运动一截，哨兵转过来时，战士们便伏地不动，南面的战士们迅速地上运动。距离山顶还有两三层时，军犬突然几

声狂吠，接着敌哨兵大声发问：“谁？”并砰砰开了两枪。这时，战士们都奋不顾身地象猛虎似地扑了过去，抡起铡刀片，砍断了铁丝网，清除了鹿砦，越过了障碍物，当敌哨兵慌慌张张地逃回伪军驻扎的碉堡时，战士们也紧随着冲了进去，在一阵“缴枪不杀”的喊声中，十余名皇协军一齐乖乖地举起双手缴了械。

这时，距离伪军碉堡不远的日军碉堡上的一挺歪把子机枪和一个掷弹筒，一阵紧似一阵地疯狂扫射着。子弹在我们头顶上嘶叫，掷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落在阵地上猛烈爆炸。受伤的民工在疼痛地哭喊着。战士们刚把俘虏的伪军押出碉堡时，碉堡上的日军便破面而出冲了下来。经过一排子机枪、步枪、手榴弹反击之后，日军又退回碉堡。紧接着部队发起了冲锋，日军龟缩在碉堡里死硬顽抗。由于我军的武器装备太差，既没炮又没有炸药，一时难以得手，指导员杨永恩一颗手榴弹顺着敌人的枪眼扔了进去，六班班长王炳玉冲到碉堡门口时，腿部挂花，另有两个战士也负了伤。天已到拂晓，这时，能清晰地听到文水城的日军已经出城的隆隆炮声。为了在增援的敌人赶到之前撤出战斗，连长张济堂下达了迅速撤出战斗的命令。

翌日清早，部队在晨光的沐浴下，在二道川窄窄的山路上押着俘虏向西行进着。

文水县抗日政府的铜印

在抗日战争时期，其他县抗日政府用的大印都是木刻的，唯有文水县政府用的是原南京政府发的铜印。据老干部文建明、王彪同志回忆说：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旧县长逃跑，牺盟会派李实安出任文水县长，日寇侵战文水后，李实安将这颗大印带到离石，交给工卫旅。一九三

八年顾永田任文水县长，又将大印带回文水。所以我县政府一直用的是铜印。据林哲同志说：解放战争时期，县政府有关工作人员因印沉重，不好携带，被寄藏在一个山洞里失落。

（文堂、照谦整理）

忆坡头阻击战

周占科

一九四四年秋，我八分区六支队正在三道川的龙兴一带休整，由苏联、英美等国的记者组织的参观团从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到了延安，又从延安来到我们这里。他们这次来到抗日前线，要亲眼目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否真象蒋介石、国民党宣传的那样，不服从军令、政令，闹摩擦、打内战，不抗日，游而不击。在部队驻地——龙兴，支队首长热情地接待了参观团的全体成员，以白面和在山林里采摘的野生蘑菇招待了客人。在当时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这样的吃食算是很不错的了。

不几天，部队由龙兴开往汾阳边山。经过战前动员，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向山下进发，攻打日军据点协和堡。外国记者参观团在部队的警卫下也登上山头，观察下面夜战的情景。二连的任务是消灭协和堡据点之敌，九连（我在该连当战士）的任务是打援，阻击汾阳城前来增援之敌，全连埋伏在协和堡附近的河滩上。当时协和堡的日军只有十多人，全部是新近从临汾换防来的，都是中、下士（班长、付班长），人数虽少，但战斗力无疑是比较强的。在一个多小时的激战中，敌人死硬顽抗，拒不投降。经过激烈搏斗，除两名受伤的日军被抓获外，其余全部被击毙，武器弹药和军事物资全部被缴获，拂晓前战斗结束。为了庆贺这一胜利，上级决定在冯家山底召开有外国记者参观团参加的祝捷大会。这时，我连又接受了掩护的任务，当太阳升起一竿多高的时候，我连开到了边山的坡头村担任警戒。

坡头离协和堡只有二十余里。我们进

村时，村里老乡怕敌人报复，大都躲出去了，只有村边的麦场上，由我军战士看守着被俘的两名日军，我方牺牲了的战士尸体也还未处理。进村后各班抓紧时间准备早饭。当我们刚把碗端起来还没来得及吃时，就听外面呼呼几声枪响，敌人来了。我们赶紧把碗放下，提起枪跑了出去，迅速散开，占领了山头 and 老乡的窑顶，准备后高临下阻击敌人。日军昨夜在协和堡惨遭失败，哪能善罢甘休？他们集中了几倍的兵力反扑过来，气焰十分嚣张。如果我们这次阻击打不好，就会影响到祝捷大会的召开，外国记者参观团和上千军民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这时，敌人从沟底的高粱、玉米地里运动着，眼看着摸上来了，连长命令不进入射程不开枪。我们心里默数着：一个、两个……六个、七个，……五十米……四十米……三十米，近了，连长喊了声“打”！我们的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开火，打得敌人连滚带爬地退下去，阵地上留下几具尸体和受伤的敌兵。不一会儿，敌人的九二式重机枪嘶叫起来，小钢炮炮弹在阵地上不断爆炸，敌人又一次组织冲锋，我们又一次把敌人打下去。几个回合过后，敌人伤亡惨重。我们在阳光的炙烤下，又饥又渴，有人请示了领导，抽空从窑顶溜下，到老乡院子里装了些果子，分给大家，一边战斗，一边充饥解渴，就这样坚持到太阳将要落山。当冯家山底的祝捷大会在隆隆的枪炮声中圆满结束，部队和群众安全转移后，根据支队首长的命令，我连才向北下到沟底，撤往后面的大山上。当敌人战

兢兢、磨磨蹭蹭地摸进坡头村里时，已经鸦雀无声、空无一人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汾阳城敌人在城外点燃了两堆大火，火光直冲天空。这是要敌人撤退的信号。酣战了一天的九连战士们，满怀胜利的喜悦，

在敌人撤离坡头村之后，也迅速转移了。

通过这两次战斗，外国记者参观团看到了事实真象，明白了蒋介石、国民党对我党我军的诽谤、中伤，只不过是出于战略上的需要所进行的一种欺骗宣传。

西社镇战斗的概况

张 贵 仁

一九四四年一月间，我们分区六支队在西陷家沟，与日军的一次遭遇激战中我的右手挂花，被打掉食指。出院回队后，在二中队队部当了通讯员。就是这年冬天，大约是十月二十儿的一天晚上，部队从汾阳开到文水南庄镇，次日晚上准备解决西社镇日伪据点。

当时，西社镇据点有东、西两个碉堡，西碉堡驻着伪军一个中队，队长岳维琪，东碉堡住着伪军一个中队，队长吕子卿。吕子卿和咱们已经有了联系，这一次行动，就是他送出的情报，说好当晚十二点钟，他在里面接应我们。

到南庄镇的第二天晚上，由支队姚教导员带领我们两个中队开往西社镇，出村之后，为了减轻脚步声，以避免被敌人发觉，距西社镇还有六、七里地，上级命令部队都脱掉鞋，赤着双脚，踏着茬地前进，到达西社镇时已经是八点多钟了。

部队到达西社镇。村北边有一处庙，庙两厢有两个碉堡，王振帮（一中队队长）带领一中队攻西碉堡；张德成（二中队队长）带领二中队解决东碉堡。

我们二中队推开据点的门进去后，被敌军发觉，叫人家从炮楼上甩下手榴弹，有个战士（刘谋儿，北齐人）被炸伤腹

部，肠子掉了出来，抢救出来不一会儿就死了。我们往里甩了几个手榴弹，二次冲了进去。吕子卿把他的部下喊煞住，他说：“不要打，是自己人！”伪军们就缴枪投降了。

在二中队解决东碉堡伪军的同时，一中队向西碉堡发起进攻。侦察排长穆生金带领十多名战士，拿着铡刀冲上去砍据点的门子，被伪军从炮楼上往下扫射，当场牺牲了五人，其中有穆生金（中庄人）、张义才（桥头人），其余三人我记不得名字了。这时候，敌我双方展开了激战，吕子卿向碉堡喊话，岳维琪在里边大骂吕子卿。双方一直打到快天明，我们部队才撤了下来。要是迟天明两小时，就把岳维琪这个中队的伪军消灭了，

队伍撤退时，把吕子卿的老婆孩子也接了出来，雇了个轿车把他们送到边山一带。

西社镇这次战斗，俘虏伪军三十多人，缴获机炮一挺，步枪三十多支，还有一些子弹。我们牺牲了六个同志，特别是侦察排长穆生金的牺牲，是一个大的损失。我初参军时，他就和我在一起，在我们队伍里他很勇敢。

（穆照谦代笔）

穆生金烈士简传

县政协文史编委会

穆生金，原名连基，乳名六儿。（一九二二年二月十六日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生在文水中庄村（现改为穆家寨）一个下中农家庭，童年时丧父，幼年上小学三年辍学，与两个哥哥种田。一九三八年夏自愿参加八路军，先后在文水公安局、文水县二大队、晋绥八分区六支队任战士、侦察员、侦察班长、侦察排长，共产党员（入党时间不详），战斗英雄。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农历十月二十七）在文水西社战斗中英勇牺牲，终年二十二岁。

中庄村距文水县城西南十七华里，地处吕梁山前哨丘陵地区，“七七”事变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抗日政府人员常在这一带活动，对群众进行抗日教育，组织自卫队、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生金的五哥穆连有担任自卫队长（一九四二年冬被日寇抓到城内杀害）生金是自卫队员，在从事革命活动中，他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因此于十六岁那年便自愿参加了八路军，走上革命征途。

穆生金在部队六年多的抗日斗争中，对敌斗争坚决，英勇机智果断，爱护人民群众，作战不怕牺牲。曾获部队战斗英雄称号。

他对敌斗争坚决。一九四二年春生金同志在家养病，被城内伪军抓获，伪军们

都骑自行车，命一伪军带上生金回城，走在半路上他挣脱绑绳、推倒带他的伪军，开腿就跑，三十多名敌人边追边向他开枪，生金从荏地逃回。事后他说：“宁肯叫他们打死，也不能叫敌人抓回城去。”

他英勇机智果断。一九四三年春的一天，穆生金领着一个排在河西村西梁上，正遇文水县伪县长带领四五百伪军向我抗日根据地康家堡进发，虽然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但他临危不惧，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全排战士用“排子枪”把这伙敌人打得狼狈逃窜，马西村西扔下百十辆自行车。生金同志怕马西群众受害，对这些战利品一辆没拿，让马西村公所收起送交城内伪军。同年秋的一天，生金带一排战士下平川活动路经家乡，回村后就让村公所公人去孝义镇日伪据点送情报，说村里来了四五百八路。“情报员”走后，他把部队埋伏在村南枣树地内，将一面红旗插在东门楼上。敌伪的一个警备队长奉日军命令，带一百多伪军前来作战，当他走至马东村西时，看到八路的红旗，吓得他装说“肚子疼”，带着伪军龟缩回去。至今村上的人还传颂穆生金的一杆红旗吓退百名伪军的事呢。

他对交城、文水、汾阳的地理很熟。晋绥八分区六支队当时主要活动在交城、文水、汾阳三县，有时在山上，有时下平

川。担任侦察排长的穆生金，对这三县的地理以及敌人的布防了如指掌，部队每次行动，即使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只要有他带路，就能巧妙地绕过敌人的封锁线，顺利地到达目的地。

他在作战中不怕牺牲。一九四一年春天，日军在孝子渠村北龙王山上扎下据点，第二天晚上，穆生金所在部队十多人摸上山去，他第一个拿的铡刀冲了上去，砍断铁丝网，往里扔手榴弹，双方激战一小时多，虽未消灭敌人，也吓得日军几个晚上不敢睡觉，每晚向外乱打枪。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夜，六支队攻打西社日伪据点，他身先士卒，带领十多名战士冲

到据点门前，激战中中弹牺牲。时至今日，与生金同志一起战斗过的战友们还很怀念他，他们说：“穆生金是好样的，可惜他牺牲了！”

生金同志牺牲后，当时和他一起牺牲的五名战友埋在一个坑内。因为他是侦察排长、战斗英雄，抗日政府领导文政同志把一个背包给他挎在身上，于一九四五年秋他的家属就以背包为志，领回尸骨，葬于他的故乡村西宋家渠地内。晋绥八分区司令部给其家属发了烈士证书。

（此件根据穆生金的侄儿穆占福、离休老干部王宪礼以及他的生前战友王彤、张贵仁、王春云等同志提供资料整理）

八月十五杀鬼子

郑家庄老党员 田肇利

我是一九三九年参加汾文游击队的（一九四一年改变为决死四纵队三十五团），和我同期入伍的有田肇玉、田广梅、马吉富、田全宝、田润、马成彪、田肇恩以及苏家堡的二黑子。全队六十多人，活动在南北齐、徐家镇一带。

一九四〇年八月百团大战开始后，我们的部队驻在文水吕家山，离开棚镇较近。当时开棚日军驻防三十多人，伪军一个班。伪军里有咱们的两个底线，一个姓成，南徐人，一个姓弓，开棚人。这年农历八月十五，我们接到成、弓两人的情报，说据点内只有日军十多人，伪军一个班，要让部队前往袭击，由他们接应。

游击队指导员徐振富、队长杜学全集合队伍，作了战前动员，当天晚上出发，

赶到开棚时已经十二点多了。我记得日、伪军就住在村中偏西的一个四合头院内，在咱们底线的配合下，先摸掉门前的一个哨兵（伪军），战士们就一拥而上，闯了进去。日军在两个房间睡着，我们闯进一间房内，活捉了三个日本人，另一房内的日军发觉后，在屋内反抗，我们就往里面扔了一排子手榴弹，又朝里打了一梭子机枪，把六七个日军都打死，又活捉了三个伪军，也有的逃跑。就这样很顺利地结束了战斗，部队扛着缴获了一挺机枪、五六支步枪，押解着日、伪军俘虏胜利返回西山。

这次战斗，正好是我国传统节日中秋节，因此战士们说：咱们这叫八月十五杀鬼子。

（穆照谦代笔）

忆郝耀同志

张松涛

郝耀，原名郝希伟（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二年）文水县文倚村人，一九三六年文水城内第一高小毕业，一九三八年春参加一二〇师特务团，年余后脱离部队回家，一九四〇年春夏，参加文水县抗日政府教育科领导下的教师，后任文水县第四区文教助理员，一九四二年冬被日寇在文水城内杀害，终年二十三岁。

一九四一年，我由工卫旅二十二团调文水县抗日政府教育科工作时，了解到郝希伟同志当教师小组长，对抗日教育工作很积极，便提拔他为四区文教助理员。当年下半年日寇在文水平川实行“强化治安”，我县党和政府针对这一形势，采取隐蔽政策，开展对敌斗争。随即将各区文教助理员转为一般教师，从此他更名为郝耀，以教师的身份转入地下秘密工作。

一九四二年暑假期间，日伪新民教育分会下令通知文水平川所有教师进行日语培训，其目的是使教师学会日语，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我政府根据当时情况，经研究决定：除少数亲日教师不予批准外，一般的教师（包括做秘密工作的教师）准予进城培训，以取得合法身份，进行抗日教育工作。并以区分别类型召开了教师座谈会，对不同教师提出不同的要求。

对我方秘密工作的教师提出的注意点是：提高警惕，情况如有变化，想方设法出城。并注意团结好一般教师，监视亲日教师的活动。

对一般教师约法三章：第一，教师之

间，特别注意互相团结，不得以公报私，相互倾轧，避免和抗日工作的同志往来；第二，不得向敌谄媚逢迎，乱说我方情况；第三，开展相互监督，训毕向抗日政府教育科汇报。

对亲日教师提出的要求是：你们要表现好，希望你们自重，不要忘记你们是中国人的，媚敌献亲，陷害同志，抗日政府和人民是不会宽恕的。后又个别布置了一项工作：即参训完毕后，要把日伪情况，给我方做汇报。

郝耀经批准参加了这次日语训练。当日语训到二十多天将要结束之际，敌方传出新民会要传郝耀谈话。此时他本应设法出城，但他认为新民会教育分会主任张进贤是他小学时的老师，他到新民会找张进贤，妄图让张对他保护。结果走到半路上，就被日本便衣将他抓到日军司令部监禁起来。经过几次的审讯，严刑拷打，致他患伤寒病。在一个深冬的夜晚被审讯回狱后，他少气无力地对同狱住的方园村村长李本深说：“我是活不成了，悔不该不听抗日政府教育科领导的忠告，盲目相信自己有靠山张进贤老师，送了我的命。但我只承认当过八路军，没有暴露参加教育工作的秘密活动。你将来见到我方教育科的同志说一下，我至死没有承认我担任的秘密工作”。据李本深后来告我说：果然在最后一次午夜被提审走后，再没见他回到狱室。

回忆李先展同志

张松涛

李先展（别名捷斋），文水县桥头村人（1902—1947）幼年家贫，经村里帮助学费，于一九一八年考入文水城内第一高小读书。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三年毕业后就留校任初级教师。一九二四年因工资待遇低，维持不了家中的生活，便辞教赴外地经商，曾在绥远、新疆伊犁等地当店员八年，于一九三二年才回家结婚，婚后仍在桥头村当乡村教师。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经文水城内女子高小教师李虎臣（革命烈士）动员，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八年一月，因相随他上山一同参加游击队三支队的妹子李玉莲（后也是抗日教师）害了伤寒病，李虎臣便让他送妹子下山养病治疗，并告他说：

“如一时不能上山随部队活动，即可在当地以教师合法身份，坚持抗战工作。”自此，李先展就由文水抗日流动教育团的刘芳吾同志分配任教师小组长，领导桥头村周围的教师进行抗教工作。在漫长的战争岁月里，该同志对抗教工作，一贯积极认真，所以在我一九四四年冬由晋绥分局二次调回西北行署八分区（文水）做文教统战工作时，便将李先展提升为秘密文教助理员，在文水六区一带活动，公开合法身份仍是桥头村学校教师。日本投降后，在解放战争转入阎军水漫平川之际，于一九四七年九月被敌人抓捕，经爱乡团严刑拷打，始终未暴露身份，后来敌人将他捆至县城南门外，用刺刀捆死，壮烈牺牲。

我的启蒙老师孔玉兰

离休老干部 吕云仙

一九三四年，我的家乡南明阳村请来一位女教师，单独成立女校（后来和男校合并），她的名讳孔玉兰，是我的启蒙教师，这位师长对我的成长，走上革命道路，起了积极引导的作用。

孔玉兰（1909——1943）文

水城内东北角在城营（俗称打狼背儿），文水城内女子高小毕业，自幼许配武午村一个姓王的为妻，王家贫寒，婆母聪明厚道，婆媳关系很好。玉兰老师在外任教，走到那儿将其婆母及小女儿王桂仙带到那里。十多年她先后在武家寨、南明阳、北